

毛泽东 周恩来 刘少奇 邓小平

论教育



C, 40-0927
R27

毛泽东 周恩来 刘少奇 邓小平

论教育



(京)新登字 113 号

毛泽东 周恩来 刘少奇 邓小平
论教育

人民教育出版社教育室 编

*

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总店科技发行所经销

华云电子数据中心照排

人民教育出版社印刷厂印装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2.5 字数 291000

1994 年 3 月第 1 版 199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107-11049-7

G·3013 定价 9.70 元

选 编 说 明

为了帮助广大教育工作者和各级各类师范院校的师生学习、领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导师的教育思想,学习他们观察、研究教育问题和教育决策的立场、观点、方法,以便更好地指导我国的教育理论建设和教育实践,使我国的教育工作更好地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国家教委师范教育司委托人民教育出版社组织选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教育》、《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论教育》两本书。

两本书的选编,贯彻了以下两条基本原则。一是针对性。选编要适应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新时期培训广大教育行政干部和教师的实际需要。据此,两本书选编的内容,并不是包罗马、恩、列、毛泽东等有关教育的所有论述,而是选取其中最主要、最具有代表性的论著(摘录)。它有助于读者把握马克思主义有关教育的基本观点,并对读者今后进一步深入学习和研究起到一定的导向作用。二是科学性。选编内容力求完整、准确地反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革命导师的教育思想。一方面,所选条目相对集中,围绕一系列最重要、最基本的观点,舍其枝节和次要部分。另一方面,每个条目选取的内容确保相对完整,包括反映当时的历史背景在内。必要时引用全文。与此同时,考虑到教育本身的性质和特点,两本书还注意了适当放宽选编的范围。教育既具有社会上层建筑的成分,又同社会物

质生产发生直接联系，还同社会的文化、科学、技术以及哲学的认识论等密切相关。教育又同人的本质属性直接相联系。选文就不止局限于直接论述教育的内容，而且包括了上述与教育密切有关的内容。

关于两本书的体例，借鉴了过去选编这一类书的经验教训，选编者采用了按专题分类和按发表的时间顺序编排相结合的方法。每本书按教育的基本问题依次分列为若干专题，每个专题按马、恩、列和毛、周、刘、邓的次序，分别依照著作的年代时间顺序排列。这样，既便于读者有针对性地学习，又能使读者看到作者思想发展的历史线索，有利于读者完整、准确地理解。这种编排方法特别强调不能脱离开当时的时间、地点和条件，防止孤立地从字句上去理解，重在把握论著的精神实质，掌握马克思主义关于教育的立场、观点、方法。

编入本书的选文，选自《毛泽东选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版）、《毛泽东著作选读》上、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版）、《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1版）、《毛泽东题词墨迹选》（人民美术出版社、档案出版社1984年第1版）；《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版）、《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版）、《周恩来教育文选》（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1版）；《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版）、《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版）；《邓小平文选》（1975—1982）（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版）、《邓小平同志论教育》（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1版）等著作。

选文的注释，基本上照原书辑录，只作了某些必要的技术性处理。

参加两本书的选编工作的有：人民教育出版社教育室胡寅生、邱瑾、肖云瑞、杨以和、诸惠芳、王莉、李复新。参加审阅修改工作的有：陈桂生、石佩臣、刘芹茂、励雪琴、劳凯声。师范教育司连秀云参与了两本书的规划和组织工作。两本书由师范教育司司长金长泽、人民教育出版社总编辑吴履平审稿，并由国家教委的领导审定。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2年5月

目 录

一、教育与政治经济的关系,社会主义教育为无产阶级 政治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1
二、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和社会主义建设者	29
三、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59
四、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90
五、理论联系实际	132
六、知识分子和人民教师	197
七、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292
八、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	319
九、共产党对教育事业的领导	371

一、教育与政治经济的关系， 社会主义教育为无产阶级 政治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和森兄子昇兄并转在法诸会友：

接到二兄各函，欣慰无量！学会有具体的计划，算从蒙达尔尼会议及二兄这几封信始。弟于学会前途，抱有极大希望，因之也略有一点计划，久想草具计划书提出于会友之前，以资商榷。今得二兄各信，我的计划书可以不作了。我只希望我们七十几个会友，对于二兄信上的计划，人人下一个详密的考虑，随而下一个深切的批评，以决定或赞成，或反对，或于二兄信上所有计划和意见之外，再有别的计划和意见。我常觉得我们个人的发展或学会的发展，总要有一条明确的路数。没有一条明确的路数，各个人只是盲进，学会也只是盲进，结果糟蹋了各人自己之外，又糟蹋了这个有希望的学会，岂不可惜？原来我们在没有这个学会之先，也就有一些计划，这个学会之所以成立，就是两年前一一些人互相讨论研究的结果。学会建立以后，顿成功了一种共同意识，于个人思想的改造，生活的向上，很有影响。同时于共同生活，共同进取，也颇有研究。但因为没提出具体方案，又没有出版物可作公共讨论的机关，并且两年来会友分赴各方，在长沙的会员又因为政治上的障碍不能聚会讨论，所以虽然有些计划和意见，依然只藏之于各人的心里，或几人相会出之于各人的口里，或彼此通函见之于各人的信里，总之只存

于一部分的会友间而已。现在诸君既有蒙达尔尼的大集会，商决了一个共同的主张，二兄又本乎自己的理想和观察，发表了个人的意见，我们不在法国的会员，对于诸君所提出当然要有一种研究、批评和决定。除开在长沙方面会员即将开会为共同的研究、批评和决定外，先述我个人对于二兄来信的意见如左。

现在分条说来。

(一)学会方针问题。我们学会到底拿一种什么方针做我们共同的目标呢？子昇信里述蒙达尔尼会议对于学会进行之方针，说：“大家决定会务进行之方针在改造中国与世界”。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方针，正与我平日的主张相合，并且我料到是与多数会友的主张相合的。以我的接洽和观察，我们多数的会友，都倾向于世界主义。试看多数人鄙弃爱国；多数人鄙弃谋一部分一国家的私利，而忘却人类全体的幸福的事；多数人都觉得自己是人类的一员，而不愿意更繁复地隶属于无意义之某一国家，某一家庭，或某一宗教，而为其奴隶，就可以知道了。这种世界主义，就是四海同胞主义，就是愿意自己好也愿意别人好的主义，也就是所谓社会主义。凡是社会主义，都是国际的，都是不应该带有爱国的色彩的。和森在八月十三日的信里说：“我将拟一种明确的提议书，注重无产阶级专政与国际色彩两点。因我所见高明一点青年，多带一点中产阶级的眼光和国家的色彩，于此两点，非严正主张不可。”除无产阶级专政一点置于下条讨论外，国际色彩一点，现在确有将它郑重标揭出来的必要。虽然我们生在中国地方的人，为做事便利起见，又因为中国比较世界各地为更幼稚更腐败应先从此着手改造起见，当然应在中国这一块地方做事；但是感情总要是普遍的，不要只爱这一块地方而不爱别的地方。这是一层。做事又并限定在

中国,我以为固应该有人在中国做事,更应该有人在世界做事。如帮助俄国完成它的社会革命;帮助朝鲜独立;帮助南洋独立;帮助蒙古、新疆、西藏、青海自治自决,都是很要紧的。以下说方法问题。

(二)方法问题。目的——改造中国与世界——定好了,接着发生的是方法问题,我们到底用什么方法去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的呢?和森信里说:“我现认清社会主义为资本主义的反映,其重要使命在打破资本经济制度,其方法在无产阶级的专政”。和森又说:“我以为现世界不能行无政府主义,因在现世界显然有两个对抗的阶级存在,打倒有产阶级的迪克推多,非以无产阶级的迪克推多压不住反动,俄国就是个明证,所以我对于中国将来的改造,以为完全适用社会主义的原理与方法。……我以为先要组织共产党,因为它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据和森的意见,以为应用俄国式的方法去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是赞成马克思的方法的。而子昇则说:“世界进化是无穷期的,革命也是无穷期的,我们不认可以一部分的牺牲,换多数人的福利。主张温和的革命,以教育为工具的革命,为人民谋全体福利的革命。以工会合社为实行改革之方法。颇不认俄式——马克思式——革命为正当,而倾向于无政府——蒲鲁东式——之新式革命,比较和而缓,虽缓然而和。”同时李和笙兄来信,主张与子昇相同,李说:“社会改造,我不赞成笼统的改造,用分工协助的方法,从社会内面改造出来,我觉得很好。一个社会的病,自有它的特别的背景,一剂单方可医天下人的病,我很怀疑。俄国式的革命,我根本上有未敢赞同之处。”我对子昇和笙两人的意见(用平和的手段,谋全体的幸福),在真理上是赞成的,但在事实上认为做不到。罗素在长沙演说,意与子昇及和笙同,主张共产主义,但反对劳农专政,谓宜用教育的方法使有

产阶级觉悟，可不至要妨碍自由，兴起战争，革命流血。但我于罗素讲演后，曾和荫柏、礼容等有极详之辩论，我对于罗素的主张，有两句评语，就是“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罗素和子昇和笙主张的要点，是“用教育的方法”，但教育一要有钱，二要有人，三要有机关。现在世界，钱尽在资本家的手；主持教育的人尽是一些资本家或资本家的奴隶；现在世界的学校及报馆两种最重要的教育机关，又尽在资本家的掌握中。总言之，现在世界的教育，是一种资本主义的教育。以资本主义教儿童，这些儿童大了又转而用资本主义教第二代的儿童。教育所以落在资本家手里，则因为资本家有“议会”以制定保护资本家并防制无产阶级的法律；有“政府”执行这些法律，以积极地实行其所保护与所禁止；有“军队”与“警察”，以消极地保障资本家的安乐与禁止无产者的要求；有“银行”以为其财货流通的府库；有“工厂”以为其生产品垄断的机关。如此，共产党人非取政权，且不能安息于其宇下，更安能握得其教育权？如此，资本家久握教育权，大鼓吹其资本主义，使共产党人的共产主义宣传，信者日见其微。所以我觉得教育的方法是不行的。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以上是第一层理由。第二层，依心理上习惯性的原理及人类历史上的观察，觉得要资本家信共产主义是不可能的事。人生有一种习惯性，是心理上的一种力，正与物在斜方必倾向下之为物理上的一种力一样。要物不倾向下，依力学原理，要有与它相等的一力去抵抗它才行。要人心改变，也要有一种与这心力强度相等的力去反抗它才行。用教育之力去改变它，既不能拿到学校与报馆两种教育机关的全部或一大部到手，虽有口舌、印刷物或一二学校报馆为宣传之具，正如朱

子所谓“教学如扶醉人,扶得东来西又倒”,直不足以动资本主义者心理的毫末,哪有回心向善之望?以上从心理上说。再从历史上说,人类生活全是一种现实欲望的扩张。这种现实欲望,只向扩张的方面走,决不向减缩的方面走,小资本家必想做大资本家,大资本家必想做最大的资本家,是一定的心理。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有拿破仑第一称帝失败了,又有拿破仑第三称帝。有袁世凯失败了,偏又有段祺瑞。章太炎在长沙演说,劝大家读历史,谓袁段等失败均系不读历史之故。我谓读历史是智慧的事,求遂所欲是冲动的事,智慧指导冲动,只能于相当范围有效力,一出范围,冲动便将智慧压倒,勇猛前进,必要到遇了比冲动前进之力更大的力,然后才可以将它打回。有几句俗话,“人不到黄河心不死”,“这山望见那山高”,“人心不知足,得陇又望蜀”,均可以证明这个道理。以上从心理上及历史上看,可见资本主义是不能以些小教育之力推翻的,是第二层理由。再说第三层理由。理想固要紧,现实尤其要紧,用和平方法去达共产目的,要何日才能成功?假如要一百年,这一百年中宛转呻吟的无产阶级,我们对之如何处置(就是我们)。无产阶级比有产阶级实在要多得若干倍。假定无产者占三分二,则十五万万人类中有十万万无产者(恐怕还不止此数),这一百年中,任其为三分一之资本家鱼肉,其何能忍?且无产者既已觉悟到自己应该有产,而现在受无产的痛苦是不应该,因无产的不安而发生共产的要求,已经成了一种事实。事实是当前的,是不能消灭的,是知了就要行的。因此我觉得俄国的革命,和各国急进派共产党人数日见其多,组织日见其密,只是自然的结果。以上是第三层理由。再有一层,是我对于无政府主义的怀疑。我的理由却不仅在无强权无组织

的社会状态之不可能,我只忧一到这种社会状态实现了之难以终其局。因为这种社会状态是定要造成人类死率减少而生率加多的,其结局必至于人满为患。如果不能做到(一)不吃饭,(二)不穿衣,(三)不住屋,(四)地球上各处气候寒暖和土地肥瘠均一,或是(五)更发明无量可以住人的新地,是终于免不掉人满为患一个难关的。因上各层理由,所以我对于绝对的自由主义,无政府的主义,以及德谟克拉西主义,依我现在的看法,都只认为于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因此我于子昇和笙二兄的主张,不表同意。而于和森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

(三)态度问题。分学会的态度与会友的态度两种。学会的态度,我以为第一是“潜在”,这在上海半淞园曾经讨论过,今又为在法会友所赞成,总要算可以确定了。第二是“不倚赖旧势力”,我们这学会是新的,是创造的,决不宜许旧势力混入,这一点要请大家注意。至于会友相互及会友个人的态度,我以为第一是“互助互勉”(互助如急难上的互助,学问上的互助,事业上的互助。互勉如积极的勉为善,消极的勉去恶),第二是诚恳(不滑),第三是光明(人格的光明),第四是向上(能变化气质,有向上心)。第一是“相互间”应该具有的。第二第三第四是“个人”应该具有的。以上学会的态度二项,会友的态度四项,是会及会友精神所寄,非常重要。

(四)求学问题。极端赞成诸君共同研究及分门研究之两法。诸君感于散处不便,谋合居一处,一面作工,一面有集会机缘,时常可以开共同的研究会,极善。长沙方面会友本在一处,诸君办法此间必要仿行。至分门研究之法,以主义为纲,以书报为目,分别阅读,互相交换,办法最好没有。我意凡有会员两人之处,即应照此组织。子昇举力学之必要,谓我们常识尚不充足,我们同志中尚无专门研

究学术者，中国现在尚无可数的学者，诚哉不错！思想进步是生活及事业进步之基。使思想进步的唯一方法，是研究学术。弟为荒学，甚为不安，以后必要照诸君的办法，发奋求学。

（五）会务进行问题。此节子昇及和森意见最多。子昇之“学会我见”十八项，弟皆赞成。其中“根本计划”之“确定会务进行方针”，“准备人才”，“准备经济”三条尤有卓见。以在民国二十五年前为纯粹预备时期，我以为尚要延长五年，以至民国三十年为纯粹预备时期。子昇所列长沙方面诸条，以“综挈会务大纲，稳立基础”，“筹办小学”，“物色基本会员”三项为最要紧，此外尚应加入“创立有价值之新事业数种”一项。子昇所列之海外部，以法国、俄国、南洋三方面为最要。弟意学会的运动，暂时可统括为四：1. 湖南运动，2. 南洋运动，3. 留法运动，4. 留俄运动。暂时不必务广，以发展此四种而使之确见成效为鹄，较为明切有着，诸君以何如？至和森要我进行之“小学教育”、“劳动教育”、“合作运动”、“小册子”、“亲属聚居”、“帮助各团体”诸端，我都愿意进行。惟“贴邮花”一项，我不同意，请再见示。现在文化书社成立，基础可望稳固，营业亦可望发展。现有每县设一分社的计划，拟两年内办成，果办成，效自不小。

（六）同志联络问题。这项极为紧要，我以为我们七十几个会员，要以至诚恳切的心，分在各方面随时联络各人接近的同志，以携手共上于世界改造的道路。不分男女，老，少，士，农，工，商，只要他心意诚恳，人格光明，思想向上，能得互助互勉之益，无不与之联络，结为同心。此节和森信中详言，子昇亦有提及，我觉得创造特别环境，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大业，断不是少数人可以包办的，希望我们七十几个人，人人注意及此。

我的意见大略说完了。闻子昇已回国到北京，不久可以面谈。

请在法诸友再将我的意见加以批评,以期求得一个共同的决定,个人幸甚,学会幸甚。

弟 泽 东

九年十二月一日,文化书社,夜十二时

根据《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三集刊印。

选自毛泽东:《致蔡和森等》(1920年12月1日),《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10页。

为着革命战争的胜利,为着苏维埃政权的巩固与发展,为着动员民众一切力量,加入于伟大的革命斗争,为着创造革命的新时代,苏维埃必须实行文化教育的改革,解除反动统治阶级所加在工农群众精神上的桎梏,而创造新的工农的苏维埃文化。

谁都知道,国民党统治下一切文化教育机关,是操在地主资产阶级手里的。他们的教育政策,是一方面实行反动的武断宣传,以消灭被压迫阶级的革命思想,一方面施行愚民政策,将工农群众排除于教育之外。反革命的国民党把教育经费拿了作为进攻革命的军费,学校大部分停办,学生大部分失学。因此在国民党统治之下,造成了人民的愚昧无知。全国文盲数目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对于革命文化思想则采取极端残酷的白色恐怖。任何进步的文学家、社会科学家,一切文化教育机关中的革命分子,都要受到国民党法西斯蒂的摧残。使一切文化教育机关变成黑暗的地狱,这就是国民党的教育政策。

谁要是跑到我们苏区来看一看,那就立刻看见是一个自由光明的新天地。

这里一切文化教育机关,是操在工农劳苦群众的手里,工农及其子女有享受教育的优先权。苏维埃政府用一切方法来提高工农的文化水平。为了这个目的,给予群众政治上与物质条件上的一切可能的帮助。因为现在的苏维埃区域,虽然是处在残酷的国内战争环境,并且大都是过去文化很落后的地方,但是已经在加速度的进行着革命文化建设了。

根据江西、福建、粤赣三省的统计,在二千九百三十二个乡中,有列宁小学三千〇五十二所,学生八万九千七百一十人,有补习夜校六千四百六十二所,学生九万四千五百十七人,有识字组(此项只算到江西、粤赣两省,福建未计)三万二千三百八十八组,组员十五万五千三百七十一人,有俱乐部一千六百五十六个,工作员四万九千六百六十八人。这是中央苏区一部分的统计。

苏区中许多地方,学龄儿童的多数是进入了列宁小学校,例如兴国学龄儿童总数二万〇九百六十九人(内男一二、〇七六,女八、八九三),进入列宁小学的一万二千八百〇六人(内男生八、八二五,女生三、九八一),失学的八千一百六十三人(内男三、二五一,女四、九一二),入学与失学的比例为百分之六十与四十,而在国民党时代,入学儿童不到百分之十。苏区很多地方的儿童们,现在是用了一大部分时间受教育,做游艺,只小部分时间参加家庭的劳动,这同国民党时代恰好相反了。儿童们同时又组织在红色儿童团之内,这种儿童团,同样是儿童们学习共产主义的学校。

妇女群众要求教育的热烈,实为从来所未见。兴国夜校学生一万五千七百四十人中,男子四千九百八十八人,占百分之三十一,女子一万〇七百五十二人,占百分之六十九。兴国识字组组长二万二千五百十九人中,男子九千人,占百分之四十,女子一万三千五

百一十九人,占百分之六十。在兴国等地妇女从文盲中得到了初步的解放,因此妇女的活动十分积极起来。妇女不但自己受教育,而且已在主持教育,许多妇女是在作小学与夜学的校长,作教育委员会与识字委员会的委员了。女工农妇代表会在苏区是一种普遍的组织,它注意于劳动妇女群众的整个利益,妇女教育当然是他们注意的一部分。

群众识字的人数是迅速增加。识字的方法有夜校、识字组与识字牌。夜校有一定的地点,识字组在群众的家里,识字牌在道路的旁边。领导识字运动的机关则为乡村的识字运动委员会。拿兴国来说,全县有一百三十个乡的识字运动总会,五百六十一个村的识字运动分会,三千三百八十七个分会下面的识字小组,二万二千五百二十九个加入识字小组的组员。这是扫除文盲的极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这种运动应该使之向着全苏区一切城市与乡村中间开展去。

苏区群众文化运动的迅速发展,我们看报纸的发行也可以知道。中央苏区已有大小报纸三十四种,其中如“红色中华”从三千份增到四、五万份以上,“青年实话”发行二万八千份,“斗争”只在江西苏区每期至少要销二万七千一百份,“红星”一万七千三百份,证明群众文化水平是迅速提高了。

苏区中群众的革命的艺术,亦在开始创造中,工农剧社与工农歌舞团的运动,农村中俱乐部运动,是在广泛的发展着。

群众的红色体育运动,也是迅速发展的,现虽偏僻乡村中也有了田径赛,而运动场则在许多地方都设备了。

苏区还缺乏完备的专门教育的建设。但为了革命斗争领导干部的创造,我们已设立了红军大学,苏维埃大学,马克思共产主义